

THE GERMAN WAR

A Nation Under Arms, 1939–1945

德国人的战争

1939—1945 纳粹统治下的全民意志

[英] 尼古拉斯·斯塔加特 (Nicholas Stargardt) / 著 宋世峰 / 译

牛津大学教授 × 英国皇家历史学会会员
深挖私人日记 × 信件 × 法庭记录等一手资料

2015年《纽约时报》年度好书

全 景 披 露 战 时 德 国 社 会 生 活 史
真 实 再 现 纳 粹 政 权 民 意 操 控 术

德国人的战争

1939—1945 纳粹统治下的全民意志

[英] 尼古拉斯·斯塔加特 (Nicholas Stargardt) / 著

宋世峰 / 译

THE GERMAN WAR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德国人的战争 / (英) 尼古拉斯·斯塔加特著; 宋世峰译. —北京: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7.6
ISBN 978-7-5139-1563-2

I. ①德… II. ①尼… ②宋… III. ①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料—德国 IV. ①K1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 114470 号

©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7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7-4090

THE GERMAN WAR: A NATION UNDER ARMS, 1939-45 BY NICHOLAS STARGARDT
Copyrights © NICHOLAS STARGARDT, 2016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ITKEN ALEXANDER ASSOCIATES.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7 Changsha Senxin Culture Dissemination Limited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德国人的战争
DEGUOREN DE ZHANZHENG

出 版 人	许久文
著 者	[英] 尼古拉斯·斯塔加特
译 者	宋世峰
责任编辑	刘 芳
监 制	于向勇 秦 青
选题策划	森欣文化
特约编辑	康晓硕
营销编辑	刘晓晨 罗 昕
封面设计	天行健设计
出版发行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电 话	(010) 59417747 59419778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中路10号望海楼E座7层
邮 编	100142
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开 本	700mm × 995mm 1/16
印 张	31.5
字 数	480千字
版 次	2017年7月第1版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9-1563-2
定 价	58.00元

注：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

○ 绪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德国来说，与以往的战争截然不同。纳粹政权把它挑起的冲突转变成欧洲历史上最骇人听闻的战争，早在占领波兰并建立起第一个毒气室之前，它就开始使用种族屠杀手段。第三帝国在1945年走向“全面崩溃”时也与众不同，它垂死挣扎，耗尽了德国社会的全部精神和物质积蕴。德国人在柏林为了保卫帝国总理府而战斗，而日本人却没有像他们那样，顽抗到东京帝国皇宫大门前。为了实施如此规模的战争，纳粹所需要的社会动员和个人奉献必须远超战前岁月。然而，70年过去了，虽然关于战争的起源、具体进程和种种暴行的书籍已经汗牛充栋，但我们仍然不知道德国人对他们亲身参与过的战争持什么看法，不知道他们是怎样把战争坚持到底的。这本书研究的是德国人如何经历和承受这场战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非但没有随着经历这场战争的几代人逐渐凋零而黯淡，反而一直受到公众的关注。在德国更是如此，过去15年来，我们已经看到相关电影、纪录片、展览和书籍泛滥如洪水。然而，无论是学术式还是大众式的表述，对这场战争都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它们要么把德国人描绘成受害者，要么说他们是加害者。过去10年中，受害者叙述极为突出，著述者专注于挖掘曾经被埋藏的普通民众的记忆，这些民众经历过英国皇家空军和美国空军对德国城市的大轰炸、苏联红军到达前的大逃难和红军到达后频频发生的屠杀和强奸。很多德国老人一再叙述他们最为痛苦的记忆，只是想让人听到，想在身后留下记录。媒体把战争时期德国平民遭受的痛苦转化成当代人关注的议题，不吝篇幅描述他们的失眠、焦虑和反复做的噩梦。很多人自发成立“战争儿童”组织，评论家们用滥的“创伤”和“集体创伤”等词语，全部套用在这类经历

上。不过，他们谈论这些创伤时，总想强调受害者是被动和无辜的，并且希望在道德上取得共鸣：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集体创伤”的概念主要用在大屠杀幸存者的记忆方面，把政治认同赋予德国“受害者”，有望使他们更有影响力。

只有在极右派占据的政治边缘地带，才把德国平民遭受的痛苦与纳粹种族灭绝政策受害者画等号，这些人在每年的2月份都会举着“大轰炸大屠杀”的标语游行，纪念1945年的德累斯顿大轰炸。不过即使这些煽动性的活动，也远远不能和20世纪50年代西德支持的僵化的民族主义相提并论，这种民族主义崇尚德国士兵做出的“英雄主义牺牲”，把一切德国暴行归咎于一小撮顽固的纳粹分子，特别是党卫军（SS）。这种轻描淡写的冷战借口给德国国防军贴上“好”的标签，给党卫军贴上“坏”的标签，为20世纪50年代中期西德以北约正式成员的身份重新武装提供了支持。不过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国防军罪行”巡回展览的有力揭露，这种借口再也站不住脚。在这个展览中，可以看到由普通士兵实施的公开绞刑和集体处决。关于群众参与德国战争罪行的这段灰暗历史，随着学术研究深入进行，至少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人们越来越了解到这一真相。但是，把士兵们藏在制服口袋里的私人照片和他们的妻儿照片摆在一起公开展出，引发了强烈反应，在奥地利和前东德地区尤其如此。在这些地方，大多数人直到20世纪90年代还不愿公开讨论这类问题。展出引发一些反作用，随着焦点转到德国妇女和儿童成为英美轰炸和苏联强奸的受害者这个问题，一些评论家担心会回到20世纪50年代盛行的比赛谁的民族痛苦更深重这个老路上来。

然而，这两种感情色彩强烈的战争叙事平行发展，轨迹完全没有相交。它们有着相同的道德意识，在当代柏林的市中心为大屠杀遇难者竖立纪念碑就是证明，然而在谈论那段历史时，它们仍存在巨大的分歧：德国人要么是受害者，要么是加害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60周年的2005年，当我在关注德国公众的自我反省时，意识到学者和媒体只关注从那段历史中吸取正确教训的这种当代社会需求，忽略了历史研究的一个基本任务，而且是最重要的任务，即理解历史。关键在于，没有人向历史学家探询德国人如何谈论和思考他们

在那个时代所扮演的角色。例如，他们谈过多少自己曾为一个实施种族灭绝政策的政权而战这个事实吗？他们认识到这个问题后，有没有改变对这场战争的总体看法？

人们可以假设在一个处于战争状态的警察国家里，不会出现这类谈话。但实际上，德国人在1943年的夏季和秋季，已经开始公开谈论屠杀犹太人的问题，并把这一行为和盟军轰炸德国平民相提并论。在汉堡，有人注意到“平民、中产阶级和其他人都在私密圈子和大型集会上一再提出，盟军袭击德国是报复我们对犹太人的迫害”。在巴伐利亚的施韦因富特（Schweinfurt），人们的说法也一样：“这些恐怖袭击是反犹政策招来的后果。”1943年10月，美国空军第二次空袭施韦因富特后，人们的情绪低落消沉，公开抱怨说，“如果我们不那么残酷地对待犹太人，就不会遭受这些恐怖的袭击。”当此之时，柏林有关当局得到报告说，不仅德国所有的重要城市都出现这类观点，就连没有直接遭受轰炸的穷乡僻壤也是如此。

当我初次了解到这个情况时，感到非常震惊。德国人在战后普遍宣称不知道或者没参与那些犯罪，但我已经知道，这只是糊弄人的借口。现有研究表明，早在战争没结束时，德国就已经流传着大量关于种族灭绝的消息。通过前线的书信和照片、士兵在火车上和回家探亲时的谈话，这类新闻已经通过党卫军家属、铁路工人、其他目击者及BBC（英国广播公司）德语广播和中立媒体流传回德国。但像其他历史学家一样，我以为这类信息大多只是在密友和家人之间小心翼翼地传播，在私密圈子以外，只有匿名的流言。大屠杀怎么可能成为大庭广众之下的话题呢？此外，这些讨论是受秘密警察当局监控和分析的，在此前两年中，正是这些秘密警察机构对犹太人进行了流放和屠杀。更诡异的是警察和党卫军首脑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收到这些报告一两个月之后，仍然向第三帝国的领袖们断言，只能他们才能担当灭绝欧洲犹太人的责任，“我们要把这个秘密带到坟墓里去”。那么这个所谓的秘密是怎样泄露的呢？近25年来，当我们思考纳粹时代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大屠杀已经成为一个焦点问题。但这种观点出现的时间相对不算太久，而且对于德国人如何看待他们在那个时代所扮演的角色这一问题，我们无法从中了解。

1943年11月18日，奥古斯都·托波韦恩（August Töpperwien）博士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听到我们在立陶宛灭绝犹太人的消息，从婴儿到老人都没放过，内容很可怕，但显然又极为准确！”他之前曾经记录过有关屠杀的流言，最早是在1939年和1940年，但没有写过这么多。这一次，托波韦恩努力想给这个可怕的事实寻找道德依据。他问自己，战争中杀掉什么人是合法的？他把可以合法杀掉的名单从敌方士兵、在德国战线后方活动的游击队员，扩展到对资敌平民进行有限的集体报复，这些确实都有某种法律依据。但是4天过去后，即11月22日，他自认如此对待犹太人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命令：“我们不仅在消灭与我们作战的犹太人，实际上我们想把他们灭绝掉。”

奥古斯都·托波韦恩是一位虔诚的新教徒和保守的校长，他从一开始就对希特勒发动的空前残酷的战争心存疑虑。托波韦恩看上去想在道德和政治上保持疏离，以显示自己不苟同于纳粹主义，这种疏离没有任何具体的反抗行为，而是在一定程度上不服从这个政权、并在“内心里”保持冷淡态度。但是，这种精神上的安全港湾存在吗？能把家书和个人日记里表达出的疑虑说成是内部反抗，而不仅仅是透露作者在两难处境中的无所适从吗？实际上，直到战争结束的最后日子，奥古斯都·托波韦恩依然忠诚服役。得出“实际上我们想把他们灭绝掉”这个重要认识后，托波韦恩沉默了。他无法使这种观点和他的民族主义思想共存，他相信德国在东线的任务是文明的，相信德国是为整个欧洲反抗布尔什维克主义。

直到1945年3月，他才再次提到屠杀犹太人的事，当时他第一次意识到，德国正面临无可避免地彻底失败：“发动这种战争的人是邪恶的。俄罗斯人在德国东部的残暴行为、英国人和美国人的恐怖袭击、我们的反犹斗争（对健康妇女实施绝育术、枪毙从婴儿到老妇的每一个人、向运送犹太人的列车注入毒气）！”德国的失败已为期不远，如果托波韦恩把这个命运视为反犹政策的惩罚，那么他也清楚，德国屠杀犹太人和盟军袭击德国人实际上性质相同。

回想1943年春夏，从汉堡（Hamburg）到施韦因富特，大后方的德国平民都在毫无顾忌地谈论德国屠杀犹太人应负什么责任，显示德国在劫难逃。1943年7月25日到8月2日，汉堡市遭到轰炸，引发规模空前的大火，半个城市被

毁，34 000人死于非命。很多德国人把这场轰炸和大火视作末日劫难。帝国保安总局（SD）报告说，由于大城市面临显而易见的威胁，“安全感”在整个德国都“骤然坍塌”了，取而代之的是“盲目的愤怒”。7月25日，即大火燃起的第一天，在德国之外又发生一件事：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当权21年后，在一场不流血政变中被推翻。德国人迅速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在接下来的5个星期中，有报告说人们公开谈论追随意大利模式、用军事独裁取代纳粹政权的话题，认为这可能是与西方单独媾和的“最好”方法，甚至是“最后”的方法。对纳粹领导层来说，这些报告似乎表明民众士气的再次崩溃，1918年的投降和革命又要重演。实际上，这次危机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随着当局对民防系统投入资源，在城市组织大规模疏散，到1943年9月初就平静下来了。随着意大利的大部分地方被德国占领，国防军的战线也稳定了，盖世太保最终对这类“失败主义”论调实施了有选择的打击。英国皇家空军轰炸机司令部发动的无差别袭击让德国人感到无助，就连广大未遭袭地区也受到影响，他们身心俱疲，没有心思公开议论德国屠杀犹太人该负什么责任，托波韦恩等人私下里也没有时间关注这个问题。汉堡轰炸引发短暂的政治危机，其意义在于让这些恐惧浮出了水面：未来的危机将会唤起类似的公开议论，德国人将他们焦虑的罪恶感和受害感混杂其中。

对德国犹太人来说，大屠杀日益逼近，无可避免地影响到他们对战争的理解，但是其他德国人对一切事物则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他们最关心的是战争，因此他们也从战争的角度来理解大屠杀。由于双方在力量和选择上极度不平等，对于同一个事件，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也导致了极为不同的希望和恐惧。这个问题影响到我撰写战时德国历史所使用的方法。其他历史学家们强调的是大规模杀戮机器，并且讨论大屠杀为何及如何发生，而我发现自己更关注德国民众是怎样把这个大屠杀当作既成事实接受和消化掉的；它是怎样影响到德国人，使他们逐渐认识到自己正在参加一场种族灭绝战争，或者换句话说，这场战争是怎样影响到他们对种族灭绝的看法。

1943年七八月间，战时德国显然一度遇到深度危机，从汉堡到巴伐利亚，人们都把盟军对平民的无限制空袭视作报复“我们对犹太人所做的那些事”。

这类关于盟军惩罚或者“犹太报复”之类的言论证实，把空袭描绘成“犹太恐怖轰炸”的无休止宣传总的来说被大众接受了，这种宣传在1943年上半年鼓噪得尤其激烈。但是，这些看法带有一种奇怪的自我谴责之意，让戈培尔和其他纳粹领导人感到惊恐。这些说话方式有暗含着想停止这种冤冤相报的战争，因为德国的各个城市正在被战火抹掉。但是，帝国保安总局通信员委婉所称的“针对犹太人所采取的措施”已经是既成事实：在欧洲范围驱逐犹太人已是此前一年的事。随着空袭不再受任何限制，汉堡大火使德国人意识到，现在面临的是一种新型的全面战争。

“是或否”“生存或毁灭”“全部或全无”“胜利或毁灭”等摩尼教二元论式的观念在德国源远流长。自从1918年德国战败后，它们就构成希特勒的中心思想，1914年8月6日，德皇发表《告德国人民书》后，它也成了德国的主要宣传论调。不过在20世纪30年代甚或战争开始的最初几年，使希特勒的统治受到欢迎的并非这种末世景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半期，德国社会发生变化，更易于接受这类思维方式。德国的气数渐尽，极端言辞慢慢没了市场，德国人的头脑开始冷静下来。随着盟军发动“恐怖轰炸”，“生存或毁灭”这个根本性的问题前景极为惨淡。在1943年的夏天，有一种恐惧广泛散播，它认为德国人无法逃脱由他们自己发动的无情的种族战争所带来的后果，更为这种危机感火上浇油。为了度过这个危机时刻，人们不仅必须放弃早先对战争进程的期待和预测，还要抛掉传统的道德顾虑，突破尚存的体面和廉耻观念。德国人不一定必须是为希特勒而战的纳粹分子，但他们发现，面对无情的战争和它带来的末世心态，他们不可能一直无动于衷。

战时危机使社会价值发生转变或者更趋激进，当我们思考纳粹政权与德国社会的关系时，便受到它的深刻影响。近30年来，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汉堡大火之后或者第6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覆灭之前数月发生的危机，让德国社会陷入不可逆转的失败主义之中：绝大多数德国人与纳粹政权日益疏离，只是在纳粹的恐怖压迫下，才不得不跟着他们往前走。实际上在战争中期，不断降低的支持和日益强化的压制之间并没有直接联系：法院判决的死刑从1941年的

1292起猛增到1942年的4457起，时值德国在斯大林格勒^①战役失败前夕。德国的法官们不是主动以严刑打击下层民众越来越强烈的反抗和不满，而是在上层（尤其是希特勒）的施压下，对一些惯犯判决更为严厉，实际上这些人通常并没有犯什么大罪。这也是一个种族司法体系，在它所判决的死刑犯中，被迫到德国工作的波兰人和捷克人的比例远超德国人。直到1944年秋天，盟军已经攻进德国本土，“普通德国人”才受到越来越强烈的压制，但是最恐怖的压制只局限于1945年3月、4月和5月的第一周这段最后的战争期间。即使在最后阶段的大规模暴力中，恐怖统治也没有使德国社会分裂和沉默：相反，很多德国公民认为，作为忠诚的爱国者，有权对纳粹的失败进行公开批评。直到战争的最后一刻，他们大多依然自认为是在为国奉献。

人们从常识出发，长期以来认为德国人成了失败主义者：历史学家把纳粹政权的成功与民众的支持画等号，把它的失败归咎于民众的批评和反对。在和平年代，这种看法的确基本上没什么问题，但在世界大战的背景下就不行了。从1943年到1945年，德国人是如何一边克服日益严重的战争创伤和损失，一边继续坚持战斗的？对于战时的失败和危机给德国社会带来的影响，《德国人的战争》提供了一个大不相同的理解。在特殊时期，恐怖无疑有它自己的作用，但它不是驱动德国人前进的唯一原因，也不是最重要的原因。德国人既无法摆脱法西斯主义，也无法摆脱战争，因为他们面对失败的命运时无法脱离所处的历史环境。他们的战况越糟糕，战争的“防御性”就越加明显。当德国人竭力想掌握主动，重新思考可能面临的命运时，后续危机不仅根本不会让纳粹政权崩溃，而且成为更加激进化的催化剂。斯大林格勒战役和汉堡轰炸这类大灾难确实使纳粹政权的支持率大幅下降，但是没有让德国人对“爱国主义奉献”产生疑问。战争压力在德国社会以不满和抵触的方式全方位表现出来，很多时候纳粹政权必须出面斡旋，消除不利影响。然而，不管这场战争如何不受欢迎，它依然比纳粹主义本身还具有合法性。德国在战争中期遇到的危机没有让德国人陷入失败主义，而是使其社会态度更趋顽固。我在这本书里关心的内容，就

① 今伏尔加格勒。——编者注

是德国人的战争反应里所包含的更加复杂、多变和令人沮丧的因素。

当动员令于1939年8月26日颁布后，德国人对未来的道路并没有概念。不过大多数人都明白，战争不可避免。他们知道过去发生过什么：最近那场战争（即第一次世界大战）有180万军人丧生；1917年经历的“芜菁之冬”；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英国皇家海军为了逼迫德国政府签订屈辱的“强制性”和平协议，直到1919年依然维持封锁德国，孩子们因此忍饥挨饿的面孔让他们记忆犹新。在20世纪20和30年代，德国政治的主题就是设法摆脱《凡尔赛和约》的约束，不过即使如1938年的慕尼黑会议这种希特勒外交政策的最大胜利，也因民众普遍害怕战争而显得黯然失色。德国人在1914年到1918年那段历史中学到的首要教训，就是不要重蹈覆辙。当战争和配给制到来后，德国人极其沮丧地接受下来。在战争的第一个冬天，民众缺衣少吃，燃煤尤其匮乏，城市居民们联想起1916年到1917年的那个冬天，对物资长期供应不足抱怨不已。党卫军情报机构“帝国保安总局”在其关于公众情绪的每周报告中向纳粹领导人一再发出的警告说，这对德国人的“坚持”能力来说尤其不是好兆头。

对纳粹党而言，他们自1933年上台后建立起来的稳定统治在战争的最初几个月时间里遇到了大麻烦。表面上，他们在战前岁月里迅速获得成功。1932年年底，纳粹党成员有85万人，到战争开始前夜，党员人数增加到550万人。而“国家社会主义妇女联盟”（National Socialist Women's League）成员为230万人，“希特勒青年团”（Hitler Youth）和“德国少女联盟”（League of German Girls）的成员达870万人，这些团体都利用晚间聚会和为期大约一周的夏令营等手段，举办意识形态训练课程。“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National Socialist People's Welfare）和“德国劳工阵线”（German Labour Front）作为工薪阶层福利和贸易联盟组织的继任者，分别增加了1400万和2200万成员。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些组织的工作人员基本上都是志愿者。到1939年，总的来说德国三分之二的人口都加入了纳粹党的至少一个群众组织。

德国社会具有“双重人格”，既对权力被动服从，又具有主动性，纳粹的这种成功就是以此为基础的。1933年，纳粹党结束了街头战争，开始着手消灭

政治左派。在警察、军队甚至消防队的积极帮助下，冲锋队（SA）和党卫军队员查封“红色”房产，逐屋进行搜查，恐吓殴打住户，逮捕地方活动分子和公职人员。多次进行这类突袭后，他们正式取缔了左翼政党：3月份共产党被禁，5月份解散贸易联盟，最后到1933年6月，社会民主党也遭受到同样的命运。当年5月，已经有5万反对者被投入集中营，他们大多是共产党员和社会民主党党员。到1934年夏，当反对左派的恐怖行动顺势向前发展时，可能至少已有20万人被新上台的纳粹恐怖机构剥夺了自由。为了迫使囚犯们服从、让他们意志崩溃，纳粹在集中营里采取公开惩罚的手段，同时还有一整套的羞辱方法和无谓的折磨。随着这些备受恐吓和惩戒的囚徒大规模获释回家，这种“再教育”计划取得了真正的胜利：到1935年夏，集中营里的囚犯只剩下不到4000人，由左派代表的“另一个德国”在政治上不复存在。

当德国于1939年8月发布动员令以后，作为预防措施，盖世太保再次逮捕了前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自19世纪60年代起，德国工人阶级的亚文化在政治上就倾向于左翼，而纳粹政权成功将其摧毁，这一点容易被人忽视。工人阶级亚文化组织的支持者确实变了。1933年以前，足球由工人运动俱乐部和天主教俱乐部主导，前者有70万成员，后者成员也超过24万。尽管“德国劳工阵线”迅速吸收了这些俱乐部，而且纳粹党对足球联盟的整个结构都进行了重组，使他们更有竞争力、更加刺激，但他们无法真正控制球迷。1940年11月，在维也纳举行的一场友谊赛以全面骚乱而告终。当终场哨吹响后，当地球迷涌进球场，向还没逃走的客队球员投掷石块。他们的巴士车窗被打破，甚至连维也纳地方长官的轿车也被砸坏。尽管“安全警察”主要把这场骚乱视作政治示威，但他们几乎错了。实际上，这两个俱乐部在传统上都有工人阶级基础，极为忠诚，原来都是“红色”。在1939年的德国杯决赛上，阿德米拉队以0：9的大比分耻辱地输给沙尔克队，阿德米拉队球迷不可避免地把原因归结于柏林裁判的偏袒，无视来自鲁尔的沙尔克队此前获得的一连串不可思议的成功。因此这场比赛本身虽然被定为友谊赛，但被维也纳地方俱乐部的所有支持者视为报仇的机会。这场骚乱有两层含义，它既是一批男性忠实球迷对邻近地区和城市表达的不满，又是奥地利人对1938年3月德奥“合并”后傲慢的“普鲁士人”涌入维

也纳进行的抗议。

这种残存的工人阶级认同已经没有什么力量。社会民主党人通过互助会、合唱团、体育俱乐部、帛金会、幼儿园和自行车俱乐部苦心建立的世界或者被纳粹组织吸收，或者被压制。1936年7月，流亡的社会民主党人哀叹他们所代表的集体认同传统已崩溃，承认“（工人）作为一个阶级，其利益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彻底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目光短浅的个人和家庭利己主义”。当左派在战后进行重组时，迅速拉到选票，却无力再造1933年以前曾经拥有的组织性极强的亚文化和认同感。战争爆发后，帝国保安总局和盖世太保当然不了解他们软硬兼施的手段有多么成功，他们继续监控工人阶级活动的威胁。

在农民、个体经营者、熟练工匠、受过教育的专业人士和管理人员这些中产阶级中，纳粹党所获得的支持可能更为牢固。新教徒热烈欢迎纳粹党的“民族革命”，希望实现可以与他们在1914年支持开战的那种热情相媲美的精神复兴。他们团结起来，拒绝魏玛“不敬神”的现代主义，将其与“1789年思想”^①、和平主义、民主主义、犹太人和其他失败主义者相联系。这种新教牧师和神学家的宽泛联盟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形成，他们宣扬创造一个新的“民族社会”，在政坛极具号召力。前自由主义者、保守主义者、天主教中央党成员，甚至还有前社会民主党支持者都记得，他们曾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魏玛时期支持过“民族社会”思想，那时它还没成为纳粹的主要口号。甚至像历史学家汉斯·罗特弗尔斯（Hans Rothfels）和恩斯特·坎托洛维奇（Ernst Kantorowicz）这样的保守犹太民族主义者，也想拥抱这种“民族革命”，但他们发现自己很难投身到这种“革命”中，因为他们是“非雅利安人”出身，不得不移民海外。

这类非纳粹党成员认为，他们的同胞要想“拯救国家”，关键在于需对1918年的失败进行“全民忏悔”。很多完全适合纳粹党的论调都是由其他人发明的，如青年神学家和前随军牧师保罗·阿尔托依兹（Paul Althaus）。他在1919年就开始谴责和平主义，声称德国人需要起来反对《凡尔赛和约》，以证

① 即法国大革命。——译者注

明他们值得再次受到神的信任。阿尔托依兹把神学观点同好战的民族主义巧妙混合起来，成为保守路德派和德国天选论的一个强大且日益重要的宣传家。不过德国人要想证明自己值得神的信任，必须进行自我救赎。更多激进纳粹分子可能想让德国人摆脱宗教，虽然没有获得成功，但他们满腔热情地赞同“让国家获得再生”这类号召。此外，其他和平主义者的观点受到阿尔托依兹这类非纳粹神学家的孤立和诋毁，如由保罗·田立克（Paul Tillich）所代表的思想。

当纳粹党取得政权后，他们决心反对大规模的社会工程，第一个目标就是要在感觉上掀起革命。上台后，他们设计出有着准军事队列、旗帜、皮靴和制服等元素的流行戏剧。纳粹的野心深入到资产阶级的核心圈子——市政剧院，在那里，他们用宣传鼓动性的戏剧替代了19世纪的传统保留剧目，歌颂20世纪20年代“自由军团”（Freikorps）^①反抗法国占领鲁尔的事迹。1933～1934年，纳粹党通过排演“露天大戏”（Thingspiele），把舞台规模发展到极致，这种新式的道德教育剧在户外演出，有着宏伟的“活画”（tableaux vivants），参演人员可达1.7万人，能吸引多达6万观众。很多大型场景表现的是战死的德国人复活过来，挽回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败结局。在理查德·奥伊林格（Richard Euringer）的戏剧《德国热情》中，大战中牺牲的士兵一个个站了起来，在舞台上列队行进，他们苍白、幽灵般的面孔在钢盔下闪耀，呼喊着渴望团结和重生的口号。

到1935年，露天大戏不再流行，市政剧院里也不再演出纳粹宣传鼓动剧。戈培尔遇到季票观众的反抗，这些人不再订购门票。他迅速改辙换道，炒掉新的纳粹剧院导演，取而代之的是有能力的传统派。绝大多数中产阶级观众想看古典戏剧，戈培尔满足了他们的愿望：1933年11月，纳粹庆祝慕尼黑“啤酒馆政变”十周年时，演出的是纳粹戏剧；10年后，变成了莫扎特歌剧。戈培尔虽

① 亦即民兵，原指志愿军。首批自由军团是在七年战争中由腓特烈二世招募。拿破仑战争中，普鲁士将领路德维希·阿道夫·威廉·冯·吕佐夫也曾用自由军团对抗法军。1918年后，它是魏玛时代半军事组织之一，曾残酷镇压共产党起义。某些军团成员于波罗的海、西里西亚与苏联作战，有时候甚至能战胜正规军。军团在1920年被正式解散。部分军团成员为后起之纳粹党要员，包括冲锋队首领恩斯特·罗姆和奥斯威辛集中营指挥官鲁道夫·胡斯。——译者注

然在演出内容上做出这类让步，但他继续为戏剧投入巨量资源——他在这方面花的钱实际上比用在宣传本身上的都多。

纳粹党成功终结大萧条所带来的极度贫穷和动荡，为德国人支持第三帝国提供了有力的论据，但是其中也有风险，这个党派及其国家机构担心，他们的成功或将被证明是短命的：他们在衡量纳粹的价值和信仰是否成功灌输给德国人时遇到严重的困难。在“民族社会”这把伞下，对于经济再分配和社会政策、生活改革（life reform）、教育学等问题存在争论，甚至就连妇女能否穿裤子而非裙子也有不同看法。希特勒小心谨慎，从不公开做出“宣教”式的发言。纳粹党的首席意识形态专家阿尔弗雷德·罗森堡（Alfred Rosenberg）确实发布过教条式言辞，他因为表现出极度反基督教的立场而名声败坏，在新政权内明显失去政治权力。

在战争开始前夜，大多数德国人既属于是某个基督教派的信徒，又加入了某个纳粹党组织。他们中的绝大多数（94%）依然是天主教或新教教会成员，加入纳粹组织的人占三分之二。在德国，教会是最重要的独立民间机构，不少顽固的神父和牧师因为在布道坛上批评纳粹，被送入集中营。1937年7月，柏林最敢言的牧师马丁·尼莫拉（Martin Niemöller）被盖世太保逮捕。在第三帝国余下的岁月中，他一直被关在集中营里。1945年4月，年轻的新教神学家迪特里希·朋霍费尔（Dietrich Bonhoeffer）^①在佛罗森堡集中营里被处以绞刑。这两人以后都成为纳粹压迫时期公民勇气的有力象征，但这都是后来的事了：朋霍费尔代表一种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神学，随着保罗·田立克流亡海外，这种思想已经被边缘化。在战后的西德，这种思想和朋霍费尔的名字一直被埋没，直至20世纪50年代末到20世纪60年代初才重新受到关注。尼莫拉则完全不同，他不是自由民主派，而是持反犹立场的保守民族主义分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是一位潜艇舰长，1919~1920年还曾经加入“自由军团”，在1924年到1933年间的选举中，他虽然是神职人员，却积极支持希特勒。当战争于1939年爆发后，尼莫拉还从达豪集中营给海军司令雷德尔上将写信，自愿再

① 又译作潘霍华。——译者注

次为国尽忠。尼莫拉在20世纪30年代表现出的异议主要是出于宗教原因，而非政治原因，他所支持的教派当时正在德国新教中争取自己的地位。

1933年，新教徒们热烈支持纳粹的“民族革命”，他们不久分裂成三种。很多牧师加入了“德国基督教运动”（German Christian Movement），他们想把精神复兴进一步发展成礼拜式和神学式运动——取缔旧约，消除新犹太（New of Jewish）的影响，禁止犹太人在新教牧师那里改宗。正统主义者想捍卫《圣经》和礼拜仪式，防止国家干涉教会，他们先创建了“牧师紧急联盟”（Pastors' Emergency League），后来又在1934年5月成立“宣信会”（Confessing Church）^①。这种分裂被误解和歪曲成自由主义者和纳粹分子为了争夺教会精神而斗争。实际上并非如此，尽管《巴门宣言》（Barmen Confession）的主要作者卡尔·巴特（Karl Barth）^②对纳粹独裁政权持批评立场，并离开德国回到瑞士，但是，即使宣信会的牧师们也很少读他的作品：巴特和大多数德国新教徒不同，他不是路德派，而是加尔文派。包括尼莫拉在内，这两派的很多牧师信奉同样的民族主义、独裁主义和社会统一政治价值观，这给了第三种中立的路德派神学家以空间，他们团结在保罗·阿尔托依兹周围，施展出巨大的影响力。阿尔托依兹没有加入纳粹党，但他称赞希特勒就任总理职位是“上帝的神迹和礼物”。尽管阿尔托依兹从来没有参加焚烧禁书的仪式，但他称焚书是正当的。纳粹于1938年11月开始屠杀德国犹太人之后，他指出，自上帝指引历史以来，他们近来遭受的苦难就证明了犹太人的罪恶。

德国天主教世界也出现分裂，不过原因在于代沟。天主教的主教们都是60到80岁的男性，他们这代人比新教的主要神学家和纳粹领袖们都老。大多数主教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数十年就已获得任命，接受的是极端保守的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神学训练，遵从其逻辑分析方法，遣词造句用语抽象。他们把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无神论的不足归因于现代性。老主教们和年轻的教士与信众之间存在一条鸿沟，在交流方式和具体政策方面都让教会内部感

① 亦译“认信教会”或“明认信仰教会”。——译者注

② 瑞士籍新教神学家，新正统神学的代表人物之一。——译者注

到不安。主教们以极其狭窄和保守的观点看待社会改革，而很多年轻的天主教徒则把1933年的“国家革命”视为机遇，更加致力于塑造德国社会。保守派和改革派的这种代沟将被战争进一步扩大。

纳粹也在施加压力，查禁了天主教青年运动，竭力让教育进一步世俗化，针对“明爱协会”（Caritas）^①创办的精神病院网络制定强制绝育的新法律。1938年暑假期间，纳粹激进分子把巴伐利亚的学校里的十字架都拆掉了，激起巴伐利亚村镇居民的强烈不满，他们谴责那些本来相熟的党卫队员、地方长官和纳粹党的意识形态领袖阿尔弗雷德·罗森堡。但是，天主教徒并没有反对纳粹的所有运动，很多人依然是纳粹组织的活跃成员，寻求其他更具同情态度的领袖支持，如赫尔曼·戈林（Hermann Göring）。希特勒表面上不对宗教表示看法，以至于慕尼黑大主教、枢机主教福尔哈伯（Faulhaber）和德国教会大主教、布列斯劳枢机主教伯特伦（Cardinal Bertram）都深信元首是极其虔诚的信徒。他们共同为国奉献，使天主教会和纳粹政权在战争期间结成近来历史学家所称的一种尴尬的“敌对与合作”关系。

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们失去了明确的精神领袖，他们只能在私人日记和信件中为自己遇到的道德问题寻找解答，这个“民族社会”中一些更具有自由主义和人道立场的成员也给历史学家们留下了无价的道德记录。

当战争于1939年9月开始后，它在德国是极不受欢迎的。然而，德国人并没有深刻反省为什么战争会发生。在英国和法国看来，希特勒无故入侵波兰，不证自明正在发动一场征服战；而大多数德国人则坚信，这场战争是国家保卫战，是由盟军的阴谋和波兰的侵略强加给他们的。长期以来，这种观点是严肃历史研究的禁区，只在新纳粹主义的网站中才能看到。对当代读者来说，当时竟然有这么多人真心实意地相信这样的说法，似乎非常奇怪，要知道，这些德国人并不是彻头彻尾的纳粹分子。他们怎么能把这样一场蓄意和残暴的殖民侵略战争胡说成国家保卫战呢？他们怎么能把自己当成受到围困的爱国者，

① 天主教慈善组织。——译者注